

【读书】



悠悠岁月 并不如烟

■ 盛丽秀

作为一个以读书为乐的人,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篇目都吸引我去阅读。说起来有一种巧合,在国外的女作家中,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和最近获奖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都是82岁高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且都患过癌症,她们孜孜以求的文学写作精神本身就打动读者,而她们的作品也确实优秀,值得一读。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介绍门罗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也被人们称为“当代契诃夫”,曾读过几本她的短篇小说集,静水流深,耐人寻味。如今打开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也是女作家独特的写作手法,呈现的是另一种文学景观。

《悠悠岁月》采用的是“无人称自传”的方式,初读有些不太适应这种无章节的散文式叙述,但当沉住气静心阅读,会一点点地进入到作家架构的细节氛围和情境当中,会发现别有洞天:悠长岁月如舒缓的电影慢镜头,娓娓道来,情节一点点铺陈、蔓延,那里有国际风云,有作家经历的法国不同时代的大事记,有世事变迁和时代发展,有家庭乃至个人的相聚、离散……如此,虽是无人称的自传,引发的却是

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即使阅读者有年龄之分,有国家地域之别,但仍能找到其中熟悉的部分并且感同身受。

小说的时间跨度有60年,在作家的笔下,说不上过往哪个时代是最好的,哪个又是最坏的时代,作家不过是悠悠岁月里一些事件的亲历见证者以及回忆和记录人。而作为芸芸众生的个体就无法选择自己身居的多变时代,只能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随流而下,从童年走向衰老。小说开篇的首句是:“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而小说结束的末句是:“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也许无人称自传的回忆留存使悠悠岁月里的往事不再淡如烟。

虽然是自传,但《悠悠岁月》的阅读并不是无章可循,小说中每一个长长的叙述语境都是由一张具有年代感的照片引领开启,不同照片定格了一个人或一家人的特别瞬间,它也是时代的印迹缩影,这样使小说中悠长的回忆自然地衔接,不显得突兀。而且作家回忆中那些日常的絮语听起来也很让人共鸣,如:“我们换了电视。彩色屏幕上的世界更美了,里面的一切都更

加令人向往。”“我们贬低它们:指责洗衣机磨损衣服,电视机损坏眼睛并使人睡得很晚。”这种对于新事物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你我不是也曾有过吗?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早在十多年前就中文翻译在中国出版,曾荣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她在2009年《悠悠岁月》中文版推出时,特意写了一封致中国读者的信,讲道:“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说《悠悠岁月》——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代的人人所熟悉的记忆,从二战直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多的动荡……它根据对从童年到进入老年的各种不同年龄所拍摄的照片的凝视,同样勾勒了社会的进程和一种生活的内心历程。在让你们沉浸于这些你们也经历过——也许不一样——的岁月的时候,愿你们能感到,其实我们完全是在同一个世界上,时间同样在无情地流逝。”

我想这是作家写作的初衷,也是读者阅读《悠悠岁月》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2022年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代表作

·荣获·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悠悠岁月》

[法] 安妮·埃尔诺 著
吴岳译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6月
ISBN: 9787020167098

书讯

《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路径研究》出版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发展思想。

新发展理念如何在民族地区落地?近日出版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路径研究》给出了答案:经济文化化。该书认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大量数据和案例分析证明了文化因素才是决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和政策因素都是外在基础和条件,只有着眼于民族文化这个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有效转型。

所谓经济文化化,该书作者——西南民族大学两位博士刘毅和郎玉屏——在深入民族地区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经济文化化指的是经济发展与本土文化的引入、导出、融合及发展过程,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即引入经济文化的同时,充分尊重本土文化,导出本土文化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与本土文化充分融合,以本土文化为根,以经济文化为脉,生长出本土特色的经济文化,最终形成本土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终实现文明发展。”

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发展理念,该书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五大路径:人力文化化、产业文化化、企业文化化、产品文化化、制度文化化。这五大路径分别体现着五大发展理念,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链条,将有力地推动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书是西南民族大学两位博士长期致力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研究的成果,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

■ 陈裕

作为历史的见证,博物馆展出的文物能让人真切了解到技艺在各个朝代发展的进程,同时,通过这些物品,当时社会的现状也可见一斑。而对于创作一本介绍参观博物馆过程的书籍来说,却是需要深厚的历史功底和文学造诣才能完成。北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丁雨的《看展去》便能让你身临其境地体验文物展览的妙处。

《看展去》一共分为四辑,每一辑就是一次参观文物展览的具体描述。这里有首都博物馆近20年的考古成果展,有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学博物馆古代音乐文物展,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丝路瓷器展览,有北京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巩义新出唐代茶器展……虽然书中提及的展览会不多,但展览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富的。无论介绍哪一次展览,作者都以历史朝代为背景,以实物为讲述源头,逐一翻开历史封册,把有形无声的物品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来,显示出作者雄厚的知识储备。

书中既有展览场馆的介绍,也有实地照片相配合,像一幕话剧,有解说,有对白,还有实物立体地呈现。诸多画面融合

在一起,让读者产生情趣横生的美感。比如作者在第一辑中这样介绍一次展览:“展览将时代标题投影于地面,作为展览单元分割的提示,别出心裁——厚重的土地默默承载了华夏祖先,又默默保存了古风遗韵,直到今人寻寻觅觅、蓦然回首,又慷慨地把记忆归还,引导我们垂首礼敬先人的开拓。”如此解读展览的意义,比眼见为实还要深入人心。

其实,对于参观一场历史文物的展览来说,更注重的是所展物品的原貌如何,它所代表的历史意义在哪里,又有着怎样的制作过程。静物虽美,但它所蕴含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参观者所关注的重点。《看展去》这本书里详细描述着这四大展览中具有代表性的物品,用历史的构架阐述着朝代发展过程中的原貌,以作者自身的知识涵量,解读着这些文物在历史中的演变。比如在第三辑中,作者对瓷器的交代让人一读便知晓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概况——“明代宫廷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一时间瓷器名匠会聚于景德镇,更让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活力倍增。与此同时,中国瓷器的主

流审美也在明代发生了巨变,原先备受追捧的青瓷、白瓷等单色釉瓷器风光不在,中西结合的青花瓷一跃成了时代新宠。幽蓝色泽的成功鼓舞了时人对色彩的想象,景德镇更创制出色彩缤纷的釉里红、五彩、斗彩等各类彩瓷,让中国瓷器的面貌更加多元、精彩。”

写这种介绍一场文物展览的文章并非轻而易举,既要懂得策展人的意图,还要把所展实物的历史背景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来。而丁雨就是凭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凭借着国内外的考古实践,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虽然这些历史事实并不陌生,但作者能从一个叙事找到另一个叙事的切入点,连贯地讲出来,营造一种历史情境的代入感,把众多的历史片段织成了具有专业体系的一张网,把不同展览的内涵清晰地呈现,构筑成一番脉络和情节,触及到了文物展览的精髓,这份功力背后是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

《看展去》一书,为读者保存了精彩的文物展览的全貌,留下一份值得回味的历史记录。我们以后参观各式展览时,可以此书为鉴,从中寻得参观要义。



《看展去》

丁雨 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5月
ISBN: 9787559848208

“民族国家”视域中的大学与国家关系

■ 郑富兴

大致在十一二世纪的欧洲,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是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两所中世纪大学。而民族国家的产生,学界较为公认的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认欧洲众多小国家有自己绝对境内宗教的权力。也就是说,先有大学后有民族国家。

在中世纪,大学更像一个教师和学生的行会组织,它特立独行且免于强权和干涉,独立自由探究知识与学问。然而,当1648年宗教战争结束,教权让位于世俗权力,民族国家随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欧洲确立并向世界各地散布。民族国家开始全面介入教育甚至控制教育,建立服务于自己的公共教育体系,大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得以复兴。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需要是大学复兴的动力和近代大学构建的重要甚至关键因素,近代大学也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手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近代大学伴随民族国家需要而产生,服务于民族国家,并使之权力合法化;另一方面近代大学也被民族化了,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和普遍性(或世界性)。民族国家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大学更是体现了这一特征。

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

中国的大门。在王朝崩塌和民族国家进程开启的历史语境下,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转型中,如何培养“国民”“国家”意识?如何实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彰显主权,与列强抗衡?从张之洞到严复,从康有为到梁启超,无一例外都将目光转向了教育。通过教育实现救亡图存,通过教育建构民族国家,通过教育实现民族富强,成为当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因此,建构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近代大学制度成为重要使命。

1901年,时任四川总督奎俊上奏清廷,提出仿京师大学堂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进士出身的翰林编修胡峻被推举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时称总理)。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使命,深知四川大学对于西南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高等学堂要“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由此可见,以胡峻为代表的四川当局和士绅举办近代大学的目的,与蔡元培在《大学令》里提出的“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如出一辙,要应对“国家之治乱”,必须发展“国家之教育”,培养“国家之人才”。1931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

公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但是“国立”有名无实,校长人选和经费划拨都牢牢掌控在四川军阀手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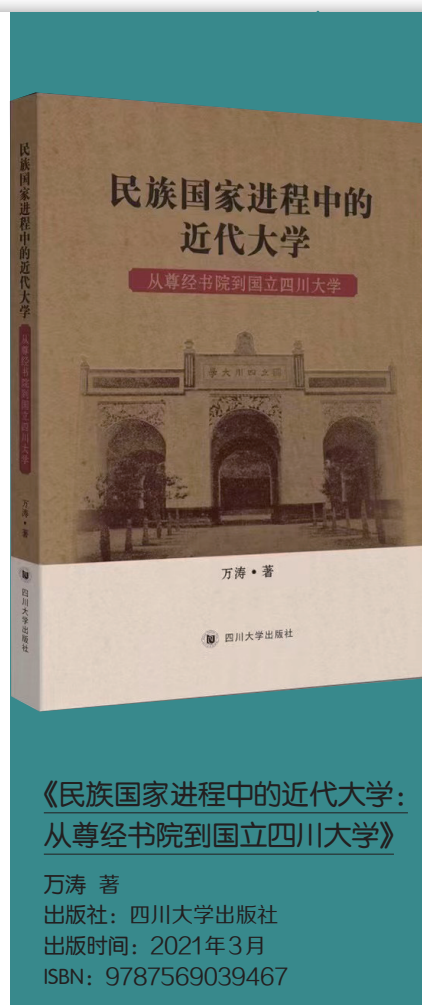
1935年,任冯均出任四川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要使四川大学成为一所“国家的大学”,即把“国立”二字落实。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国立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立大学,不是一乡一邑之学校,应造就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是“国立化”的重要部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大迅速组织了“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校长亲任后援会董事。后援会调动全校师生,联合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捐款捐物慰问前线将士,发动群众支持抗战,讲解抗战形势等。川大不但接收了大量沦陷区的外校学生,也新聘了一批来川的国内知名教授。川大师生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前方战事和国内外形势,一方面发愤学习,时刻准备报效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在后方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抗战。“抗日”“救国”成为学校生活的主题,民族国家命运成为川大师生关注的焦点,为民族国家抗战大业服务成为大后方大学的主要任务。

在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

语境下,在民族国家建构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近代大学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它作为救亡图存、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被赋予了国家主义的理想。近代大学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民族国家利益成为近代大学的最高利益,国家主义取向成为近代大学的根本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是大学在民族国家进程中应对时局和困境的艰难选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合理正当性、历史必然性。在民族国家蹒跚前进的崎岖道路上,四川大学与其他中国近代大学一样,始终为民族国家的命运而斗争,这种国家主义取向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近代大学之魂,是国近代大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万涛的这本书,以20世纪前半叶的四川大学为个案,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在国家主义取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以时间为纬,以大学和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为经,较好地阐释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过程与国别特点;运用“民族国家”解释框架分析中国近代大学特征,提出了关于近代大学与国家关系的精彩论断,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族国家进程中的近代大学:从尊经书院到国立四川大学》

万涛 著
出版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3月
ISBN: 9787569039467